



□□ 本报记者 张凤云

虽说每个人眼中的世界都有不同,我所见的也不过是这广大乡村的片段。但是每当回到家乡,跟那里的或者老人或者青年或者孩童聊天,走过打记事起就用脚步丈量过无数遍的田野,听鸟叫虫鸣,呼吸泥土味青草味混杂的空气,都会有这样一种明确的感觉:我们的乡村,并不宜简单地加以认定。

虽然城乡鸿沟依然存在,但新的事物正在不断萌生。如果用心观察,我们就能发现当下的乡村,在依然厚重与质朴的同时,有了新的迷人之处,那就是历经几千年的沉浮与几十年的变迁,传统与现代,碰撞与融合,迷茫与希望,塑造与被塑造,在这样一个普通的村庄里,几乎在同一时空平面上展开着。

现代文明冲击下,传统的乡村习俗依然坚守

这是一个离莫言小说中的“东北乡”不远,普通的都说不上有什么特点的华东小村。听老辈人说,明清时期村里是出过一个大官的,他留在家乡的眷属甚至演绎了一段不大不小的传奇。只是这些年人们更加努力地盯着眼前,随着老辈人的渐渐离去,便很少听人提起了。目前村里有500来户,姓氏庞杂,大姓势力不显,加之有几家劳保、针织类企业,日子过得看似平淡,却也没有网上常说的乡村的凋敝。

这是一个能够感受到现代文明之风与传统乡村习俗的地方。古老的传统一直延续了下来,尤其是在传统的年节到来之际,即便经历了都市文明的冲击,在某些时段某些方面依然保存完好。

人们依然在年前烧灶马给灶王爷上供,拎上酒去坟头烧几刀黄表纸;男人们精心算计迎接财神的方位,女人们在五更天煮的饺子里包上硬币和红枣。我们这些在外的人,每到年节也都携家带口回到这里,来到老人身边,感受乡土社会特有的那股烟火气。

年三十这天,堂屋里无一例外要挂一张轴子,上面画着一套冠冕堂皇的古人,空白处写着祖宗的名讳,供桌上摆着相红的蜡烛、香炉,以及几样精心挑选的点心。

初一早上男丁们照例要早起拜年。无论亲朋长辈,关系好的差的,走到堂屋里,对着供桌互通一声跪下去,磕上三个响头,算是对这家的尊重。

这些年虽然不时兴磕头了,却也不能省略了这一环,依然要各家走一走。盘腿上炕,喝碗水,聊聊天,积攒了一年的鸡毛蒜皮齁齁隔阂多少也能有所消散。

若有人想留下来说说什么,女人便会倒上茶,然后知趣地转身来到烟熏火燎黑黢黢的厨房。离灶台不远的地方,是年前刚贴上去的灶马头,拙劣的模板图像印刷在廉价的白纸上,在这被粗制滥造的工业品包裹着的乡下,反而透着一种拙朴的味道。

人们经常在一些特定的场合围坐一起,既谈农事,也谈生意。有一搭没一搭地提到季节性的雨水和灌溉,计划着犁地和锄草、播种和收割,以及各种粮食和农副产品波动的价格。

当然,有些话题具有了一定的时代感,比如网上有什么新鲜事,反腐败打老虎谁又落马了,尤其是那些关系到他们切身利益,垃圾怎么处理,厕所如何革命……这样的日子,恒常如昨,就如三十晚上的那顿饺



子和供桌上的那柱香一样,固定而直接,维系着个人、家庭和村庄的日常。

然而并不只是如此,在城市化与现代化浪潮席卷下,这里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冲击。

网络的应用大概十几年前就在村庄开始了,4G手机如今也很普遍。人们通过网络购买日用消费品,学习最时髦的广场舞,听千里之外的老中医讲养生课,更有人搞起了电子商务,在网上售卖各种手工作品……不仅方便了乡村生活,扩大了信息来源和社交面儿,甚至成了一批年轻人谋生的手段。

村里有一对兄弟,哥哥开着加工厂生产旅游鞋,弟弟则专攻网上销售,据说一年也有上百万的收入,成了街头巷尾人们谈论的对象。只是这兄弟发家的故事从十几年前讲到现在,并没有新的人物登场。

这次在听村里女人谈论油盐酱醋的间隙,还得知一件非同寻常的事。一个五十岁上下的村民坐在炕前,不急不慢地说及了此事。

“听说了吗?村里有家小子在网赌钱,赔了多少万。”“现在的年轻人看不懂。他大舅家王小子,在网上倒腾那个什么币,比特币,赚了一大笔。后来跑到大理开饭店去了,听说干得挺不错。”一位更年长的人接上了话茬。

虚拟的世界连接着现实的分层,网络的介入加速了村庄的分化。一部分人的生活变得富裕了,一部分人仍然过得紧巴,还有人在茫然无知中付出了惨重的代价。

年轻人对新事物更加痴迷,老年人依然坚守着传统。一位60多岁的老人对我说起他年轻时的事,为了赚钱,就是泥泞的小道,也要背上几十斤炒熟的花生去城里贩卖,攒回来十块八块的改善生活。那个年代,年轻人是村庄最优的劳动力。现如今,很少有青年出得了那份苦力了。

向往城市文明,并亦步亦趋地实现

《红高粱》里那座著名的火车站,是这里绝大多数回乡人的首选。往往下了车,预定的出租已在等候了。乡村的租车服务这些年日新月异,不少人抢着做这行生意,所以即便是外地来的人去农村,交通上也没有什么问题。

经县城、乡镇,直奔熟悉的村庄,可见年节购物潮带来的火热场面。县城大型商场边上车水马龙,乡镇大集上人头攒动。卖货的摊位上,喇叭里重复着这里特有的方言,“葡萄便宜了昂,三元两斤三元两斤。”“清仓处理裤子,男裤女裤条绒裤,20一条便宜便宜了昂。”包子摊儿上冒着热气,一双指节粗大的手迅速将包子装进塑料袋里。自行车、摩托车在人群里一点点往前蹭,车把上晃晃悠悠地挂着猪肉大葱。

终于挤出了这火热的人流,看到越来越低矮的房屋,墙上肆无忌惮刷着各种标语和广告,便可断定从城市来到乡村了。

今年这一路上,最醒目的便是一片刚拆迁过的住宅区,砖头碎瓦毫无遮掩地堆放在镇街主路的两旁,看来城镇化的浪潮已不可避免波及到了这里。

这些年来,乡村建房热潮有增无减,随着城乡土地增减挂钩的实施,城市的大规模开发,乡村宅基地指标也愈发紧张。据说近来的市场上,位置不错的6间瓦房连宅基地使用权已叫到了30万元高价。

相对于农业上的收入以及工厂里所得,这实在是笔不小的数目。因此人们对房屋买卖相当敏感,凡有老宅出售,消息不胫而走,不几日便尽人皆知。

一位长年在县城做生意的村民不乏理性地分析:因为毗邻青岛,这里的民营企业发展迅速。人们赶集买地瓜秧的时候就能观察到临近地区的发展。原本和自己差不多的村庄已大变模样,土地升值,诸如此类的信息不断刺激着人们。很多村民认为,村子被城市吞并只是个时间问题。

一位乡村教师的爱人也对我提起:大概20年前,只要500块钱就能在乡镇中学对面购买6间房的指标。现在那个地方已值上百万。为此她极其后悔,当初没有紧追这笔钱来,错过了一个离开村庄走向城镇的绝好机会。

随着城镇化的推进,乡村人口一部分外流,老屋并不急于出售;土地指标的收紧又使得部分结婚分户的村民无法建房。另一方面,加工制造业、畜牧业的发展也都需要土地。僧多粥少,争抢难免。

房屋在村民看来是身份的象征,因此格外舍得投入。近年来随着乡村建设的推进,农村居住条件的改善是显而易见的。户户间的水泥路也修了起来,房屋外立面统一刷成了浅浅的黄色。以往倾倒在河沟里的垃圾开始有人清理,速生杨大面积种植,乡村环境逐渐修复,野兔野鸡再现田野。

从外在形态来看,这里甚至有了社区的概念,乡村卫生站、乡村饭店,卖馒头或者卖炸货的小店都开了起来,人们的生活日益便利丰富。然而从内里来看,乡村生活并没有什么实质性改变。

村里的娱乐活动并不多,过年的时候经常看到男人们聚在一起打牌,女人则看孩子聊天。天气暖和的时候,村里会有人组织广场舞,天冷也就歇了。虽说距离莫言故居也就十来分钟车程,除非陪着回



人们经常在一些特定的场合围坐一起,既谈农事,也谈生意。有一搭没一搭地提到季节性的雨水和灌溉,各种粮食和农副产品波动的价格。
大贵贵 摄

这是记者一次春节返乡的所见所闻,本以为会随着春风秋雨而渐渐淡去,却不料在这个冬天即将到来之际愈发清晰起来。一个普通村庄的琐屑日常,有坚守,有躁动,有憧憬,亦有无奈。中国传统乡村转型的阵痛便这样一层层传导、分解到他们身上。然而有阵痛便有新生,一个崭新的时代悄然开启——

乡的亲朋,少有人去看二遍的。

十几年前还能看到一两场县剧团组织的地方戏下乡,浓妆艳抹的演员在临时搭建的台子上唧唧呀呀唱着“茂腔”(一种地方戏);或者村民自己攒的草台班子,挨家挨户给村里有脸面的人拜年讨喜;清明节有实力的人家在空场儿地里树一架秋千,全村老小聚在一起耍上几天,这些年也都没再见了。年轻些的人刷手机抢红包,小孩子“吃鸡”打游戏,一群群地在街上疯跑,到田里认认野菜捉捉虫的都少了。

逢年过节摆上桌的多是大鱼大肉,以及煎炸过的速冻食品。在我们这些从城市返回家乡的人更想吃一口自家菜园的新鲜蔬菜时,却发现村里人更推崇工厂里生产的速冻食品和快餐了。

或许是因为一年的忙碌就为年节这几日的清闲,在不需要招待客人的日子里,人们往往随便吃一点坐在炕头上唠嗑或者睡觉。对他们来说,省出来的时间和双手似乎比精心准备一顿饭食更加重要。

然而我们又怎能去责怪他们呢。即便有了机械的帮助,农活依然是劳累的。而他们对于速食品的热衷与当年肯德基进入中国,城市人的态度又何其相像啊。只不过乡村比城市晚了一个阶段,因此影响了人们的认知。对于城市文明来说,乡村的跟进总是这样亦步亦趋。而我们这些进入城市的人,先一步接触工业文明的人,回过头来再看的时候,似乎不合时宜了。

农农,或是务工,能选择的和不能选择的

冬日的夜里总是容易起雾的,早上都没有散的意思。村庄、树木、田野,笼罩在这白蒙蒙的水汽中,很是安静。

吸着这水汽十足的空气,从村头慢慢地走到村子中央,一路过去,水泥铺就的路面两侧,停着各式各样的小轿车、农用车。原来的老村部已经变成了二层小楼,开着超市、农资店或者小饭馆之类的个人家的买卖。过年的时候,蓝色或者绿色的大门无一例外贴着红对联,偶尔还能看到胶带纸反射出来的光。

这些年,村庄农业一直四平八稳,没有什么大的变化。虽也实现了机械化,却还是各家各户散种为主,没有像样的合作组织,农资价格一旦上涨,粮食价格稍有波动,都会影响农户的收成。因有各种各样的粮补贴,一直维持到现在,也无抛荒的现象。

二三产业反倒有了相当的起色。村里容纳着不少行当,有做主食的、开幼儿园的,经营日用杂货的。经过多年的新陈代谢,修鞋的、榨油的、做豆腐的皆已不见,取而代之的是劳保作坊以及几家颇具规模的旅游鞋生产企业 and 针织厂。

一条大路穿庄而过,到县城也不过半小时车程。因着县城老火车站提供的很好的物流服务,从

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开始,这里的劳保用品便一车皮一车皮运往东北等劳动强度高的地区。

服务业大都是家庭经营,并不雇佣劳力。所以村里大部分年轻人集中在加工厂上班,也有上点年纪的村民从厂子领取原料回家加工的。这些人是大工业流水线上的一环,在照顾好庄稼和家务的同时,每天不停歇地操作着简单的机械,翻拣着整捆的粗帆布或者塑胶鞋,为中高端的消费品市场贡献着体力。

除却经营上的因素,这些年来乡村外贸的衰败与内需的繁盛,很巧合地反映在了村里两家规模较大的企业上。以坐落于村西的针织厂为例,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创办,原以外贸订单为主,针对日本中高端市场,红火时聚拢了100多号女工,建有食堂,定期组织工人旅游。如今的境况却很惨淡,从剪裁到检验多道工序仅剩了三十几人,且经常不能保证全天开工。

另一家以国内市场为主打的旅游鞋企业则风生水起,据说去年一年达到了近百万双的生产能力,借助线上线下两条腿走路,产品卖到了全国各地。

村里的企业多为个人所有,小微为主,并不具有现代企业明显的特征,产业的发展速度也不足以吸纳四面八方的人涌入,因此新店铺出现的频率极低。但是,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企业,村里的农民不用背井离乡去外地打工,在家门口便可获得一份相对稳定而且不错的收入。

这一点像极了费孝通说的“蜕变中的青蛙”,拖着一条短短的尾巴。这条尾巴给了村民以喘息的机会,在向大工业转型的时候不至于那样急促剧烈,温吞吞吞,减轻代价。

留在村庄,并不发愁找不到工作,但是改变职业也是困难的。村里一个八十年代中期出生的年轻人,和媳妇两人都在工厂上班,一个在制鞋厂开机器,一个在针织厂验货,正常情况下每人每月收入3000多元。但是媳妇所在的这家厂子已有三年未正常发过工资,老板承诺的社保拖了两年未缴,所以正在犹豫是不是要换一份工作。

巨大的惯性在她身上缠绕着。这个30出头的女人不止一次跟我表示,只有离开农村才能改变他们的生活,但是去城市打工的收入也不比在村里多。像她这样结婚生子,拖家带口的,在这个小小的社会里已经有了固定的位置,要想改变更加困难。

“你说,我要是不干这个了(指检验做好的服装是否合格),我能干什么?”媳妇画着淡妆,说话慢声细语的,说完了静静地看着我。

不喜农活,对于土地的习性也毫无把握。如她这样的年轻人对城市却不陌生。他们大都上过初中或者技术职业学校,多数还在城市周边的工厂里做过一段时间的工,成家后才回到村庄定居。他们跟城里年轻人一样在生日当天举行小圈子的聚会。熟练网络操作,上网购物熟门熟路。放工之后也常常约着相熟的朋友到县城商场里消费,然后美图秀秀发到朋友圈里。

大多数人依然摇摆于农业和手工业之间,既务农也出工,保持着一种相对的平衡。只有少数人确实找到了可以安身立命的工作或者生意之后,才真正退出农业生产,过上另外一种类似于城里人的生活。

即便如此,大机器的到来毫无疑问还是提升了消费能力,村庄的日常消费也因此被泾渭分明地划分开了。

从两块钱一人次的剃头铺,城里买来的几百块的衣服,网购的上千元的化妆品保健品,在这个小村里都能见到。一些老年人穿着多年的旧衣不舍丢弃,也有年轻人大手大脚而不吝惜。节俭与时髦并存。

年轻人开着车去县城购物成为时尚,并且以这样的方式源源不断地滋养着城镇商贸的发展。老一辈还停留在乡村的集市上。逢一逢六,逢五逢十,买点锅碗瓢盆,针头线脑,或者便宜处理几块十几块一件的衣裳。

孩子们一代一代成长,有些东西却再也无法传承

村里原本是有一所小学的,只是经过这些年的调整,如今被住家或者工厂取代。偌大一个村庄已多年不曾听到读书声。

说到原因,和这些年来媒体上报道的并无二致。年轻人通过考学或者经商流向城市,村里的孩子越来越少。即便留下的,年轻的父母也想尽办法送孩子到县城的学校读书,以致从一到五年级整个年龄段的孩子都不足以凑齐一个学校,前些年索性并入邻近一个大村了。

但是乡村教育并不如想象中就这么凋敝了下去。据村里一位老师说,素质教育的理念已经开始渗入,教给学生的知识面儿更广些。老师们时不时地将教学与乡村日常结合起来,孩子们被要求放学回去数数自己家里养了几只鸡几只鹅,因此有了更多感性认知和乐趣。

县城有两家私立学校名声在外,村里一些人家但凡条件允许的,便将孩子送到城里去。在外经商打工的,则由老人带着去寄宿学校或者补习班,每到周末,乡村出租车在各个村来回奔波,拉的也大多是这些进城上学的学生。

“我们那会儿有可能跟城市发生这样的连接吗?县里最好的中学一中,普通农村孩子是没有机会去上的,那时候就开始划片剥离了。那年采取混考,很极端的一个方式,掐了全县前100名学生进去,算是给乡村学生的机会。现在大家的选择更多了,更自由了,只要有钱有意愿,就能去更好的学校。”一个从村里走出去的2000年毕业的大学生这样对我说。

2000年前后这几届是村里第一波大批量正规考出去的,这批农村孩子毕业后无一例外留在了城市工作。他们的处境给了村民极大的鼓舞,并不断强化着更年轻的人走出乡村的愿望。

然而接受变化是困难的,习惯的改变更加不易。所以光有这样的意识并不足以把他们从每天劳作、看电视刷手机的惯性中拉扯出来。大部分家长更愿意花钱给孩子买玩具,而不是买几本书,更鲜有大人和孩子一起读书的。

乡村结构的变迁也不可避免地影响着孩子们的认知。

在我们这些八零后还小的时候,村里少有人家安装电视,夏天晚饭过后大家聚到门前的大街上,铺个凉席,消夏聊天。这当空儿,老人就会有一搭没一搭地讲些“没尼巴老李”“杨家将”之类的孝亲家国故事,一日一日地渗透到了玩耍的孩子们心中,成了孩子们最初的人生启蒙。

只是随着这些年村集体活动愈发减少,村民各奔生计,繁忙与分散之下,人们之间能够聚在一起的时间少之又少。这样的经验与教化传承也随之被切断了。即便只是隔着十几二十年的时间,我们成长中所获得的那些“营养”,现在的孩子似乎已很难企及。夏天跟着大人在地里干活,你会看到刚才还风和日丽,跟着远处的天空一片乌黑,老人就会说,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云,会有什么样的雨,多长时间,依此判断是回家避雨还是在地头等待雨过天晴。

乡间带着泥土的经验就是这样一代一代传递下来的,如此鲜活,全息体验。如今机械取代了人力,孩子们也不再跟着下地,也就不会切身体会到大自然的诸多奥秘。其实孩子们也无心去听老人讲些什么,动漫游戏的吸引力远远超过老人一遍遍的唠叨。少了劳作时被雨淋的压力,自然也不会有那么多人去关心头顶上飘过的一片云彩了。

干旱少雨经常困扰着村里的人们。即便夏日,顺着一条乡土路走到村界,也少能见到夏的影子。绵延流经莫言老家的那条河几近干枯,两旁的速生杨在烈日下抖着叶子。

大街上,老人依然会站在那里静静地看着你,永远都能感受到那平淡又奇特的目光。

临近饭点儿,每家每户灶台上冒着热气。大锅里炖的土鸡,滋滋冒着油花的丸子,拉着尖锐哨声的水壶,晒在院子里猎猎作响的衣服,摆碗筷的声音,呵斥鸡鸭鸭的声音,孩子们叫喊的声音。

白云飘过,撒下阳光,受了惊动,树枝上的麻雀“呼”地一声飞走了。最深厚的文化,就在洒扫庭除中。在这里延续了多个世纪的乡村,如今正在融入现代化前进的步伐。离开的时候,小村里已渐行渐远,但墙上新刷的关于乡村振兴的大字标语,在冬日阳光的照射下鲜红鲜红的,格外醒目。